

## 编者的话

张伯驹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个极具魅力的名字。他是卓越词人、收藏家、戏剧家和书画家,1982年逝世至今的30多年里,怀念和评价他的文章、讲话不断见诸报刊,记录其生平的书藉更是频频问世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一篇纪念张伯驹诞辰120周年的文章称他是“百代高标,千秋丛碧”。

除却他的文化成就和人格魅力之外,张伯驹先生还是一位很有“故事”的人物。正是抱着这样的认识,作者张恩岭决意以实事求是、拒绝戏说的态度来讲一讲张伯驹。本报今起连载的《张伯驹十五讲》共17万字,是记录介绍张伯驹生平、文化艺术成就、人格魅力和逸闻等的传记性文学作品。作者以通俗的笔法,流畅的文字,系统、酣畅地展现张伯驹先生思想、学识的博大精深及其一生的绚丽多彩,其中穿插的许多生动故事又让该作品极富可读性,妙趣横生。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

## 第一章 人见人爱张伯驹(一)

张伯驹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正月十二,家居河南省项城市林陵镇(原项城县县城)闫楼村,距县城仅3里之遥。

张伯驹谱名家骥,字伯驹,后即以字行。初号冻云楼主,而立后改号丛碧,又号好好先生、春游主人、重瞳乡人等。但张伯驹作画、作文多署“丛碧”,久而久之,人们便以“丛碧”为其字,如他的女婿楼宇栋先生在《张伯驹小传》中说:“张伯驹字丛碧,别号好好先生。”他的女儿张传■也在《我的父亲张伯驹》一文中说:“我的父亲张伯驹,字丛碧。”丛碧也的确是个好名字,本意不就含有清灵、高远、纯洁、不染凡尘的意思吗!名副其实,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一个人。

那么,要讲张伯驹,先从哪里讲起呢?我以为,还是先从张伯驹的祖辈和父辈们讲起吧。

## 祖辈与父亲

张伯驹出生的项城县,地处河南省东南部,与安徽省交界,惯称豫东平原,今属周口市。但其时项城自然条件很差,因地势低洼,交通不便,被称为“泽国”,是一个偏僻贫穷而又闭塞的地方。

张伯驹的祖上是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移民到项城的。其祖上以耕读传家,是经过几代人的勤恳持家、攻读学业,才逐渐富裕,并成为书香之家的。张伯驹的老爷爷名叫张致远,字静斋,饱读诗书,应童子试名列前茅,仕途有望,但县太爷放出风声,意在索取贿赂。然而,张家从来是“求仁维克己,羞趋邑宰门”的主儿,不吃这一套,因此便断了仕途当官的念头。

张伯驹的爷爷叫张瑞楨,字恩周,却执意走科举之路,苦读半生,“寒窗四十载,破壁晚登龙”,直到50多岁才中了光绪甲午科(1894年)乡试举人。但也止步于此,再无进取,也没当官。

张伯驹的生父张锦芳是一位文学功底很厚、诗文颇有造诣的人。他著有诗集《修竹斋引玉咏》,其中《项城八景》多有名句,如“珠帘雾卷朝来雨,画栋云飞夕照天”“红雨乱飘岳寺树,绿荫密布野云亭”等句,气势不凡。但他谦虚好学,绝不以家世骄人,他曾两次走访淮阳县名士朱飞仙,以求在学问上切磋借鉴。可朱飞仙是位不求功名、不慕权势、性格很怪的人,其书画诗被称为“豫东三绝”。张锦芳慕名前往,第一次朱飞仙外出没见到,第二次亲临宅中,朱飞仙正在菜园浇水。朱飞仙见到张锦芳后,也没有礼让寒暄,开口便问,你找我有什么事?张锦芳说,听说朱先生诗作得好,想跟先生和和诗。朱飞仙又问道,你的诗属于哪一家?张锦芳回说,我是乱凑杂学,说不上什么家。朱飞仙说,你不入家,跟我和什么诗?转身又干活去了。张锦芳受此冷遇,并没有恼怒,反而感叹说,朱飞仙真清高名士也。

朱飞仙之所以这样对待张锦芳,是因为他知道张锦芳是张镇芳的弟弟,是权势高官之家,所以不屑一顾。朱飞仙的这种做派未必可取,却让人从中看到了张锦芳的为人和态度。

张锦芳的人品让人称赞,其政治立场和作为更令

人敬佩。民国元年,袁世凯任命张镇芳为河南都督时,正是辛亥革命风云激荡之时,革命党人不甘心袁世凯做总统,激烈讨袁。在河南,以阎子固、朱丹陛为首的部分革命党人,谋划炸毁开封军政府的火药库。张镇芳身为河南都督,则极力搜捕,严厉打击革命派,力图稳定中州政局。身为其胞弟的张锦芳,此时却反其道而行之,极力保护一批青年志士,如项城闫凌云,汝南闫秀峰、马应坦、王懋官等。因此,后来曾任项城县令的朱名昭撰写的《■庵先生懿行碑》写道:“各省戒严,党祸益烈。汝南闫秀峰、马应坦、王懋官等牵连阎子固案内,先生极力剖白,咸得无恙。”从这段记载中,张锦芳保护革命青年的行为可见一斑,一时为大众所称道。

张伯驹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到6岁,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。

张镇芳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值得被关注、知名度很高的人物,但在近代史研究中,对张镇芳的研究是很不够的,甚至是以其曾镇压过白朗起义,又参与过张勋复辟来作为其一生功过定论的。其实,这正是一种对历史人物概念化、公式化的定论,很容易形成对历史人物的误解和偏见。当然,这种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,已逐步被人们纠正了。我们已经认识到,一个人的一生经历、思想变化是极为复杂的,是不能用脸谱化去归类的。

对于张镇芳的研究,著名学者、曾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寓真先生是较为深入的,他在《张伯驹身世钩沉》一书中,有一段很精辟的话,他说:“张镇芳是一个真正的儒士,纵观他一生行藏,显然深受正心诚意、格物致知的儒家思想熏染,在云翻雨覆的政治舞台上,他一直在寻求着合乎忠信礼义的道德规范的人生归宿。伯驹的学习成长,以至成家立业,无不受到张镇芳的深刻影响。”

但在这一讲中,我们也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张镇芳的成长、为官和为人节操。

张镇芳(1863年-1933年),字馨庵,生于清同治二年十二月。前面已经说过,其父张瑞楨一生未能入仕,就在家亲自教授镇芳、锦芳兄弟。

张镇芳幼年时读书是十分刻苦的。他刚会言语,父母就口授《三字经》,继教《四字鉴略》。8岁入塾,攻读诗书。其父常于书斋伴读。有趣的是,每当张镇芳读经史涉及忠孝仁爱信义之事时,其父必大呼道:“汝辈能如此,方不愧为子,无愧为人矣。”他父亲的这一招,应该说对张镇芳的震动和影响是铭心刻骨的,对张镇芳的成长,起了大作用。平时学习,父亲又为张镇芳立下严格学规,如闻鸡而起,默背功课等,背诵时不许点灯,只准燃两根香火,让他集思静心。久而久之,张镇芳也养成了勤学强记的学风,因而,学业得以早成,并于光绪十八年(1892年)考中进士,时年29岁。

张镇芳成进士后任户部主事,是个六品京官。1900年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。张镇芳也来不及更换官服,急着追随皇帝护驾。出京城后,因有散兵土匪拦路,只好改道混杂在难民中间,一直走到衡水才有车马可乘,终于日夜兼程,到潼

关才追上銮驾,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,效劳两宫。第二年事态平息,张镇芳被赏加四品官衔。

正因为护驾迎驾,张镇芳才有了和袁世凯相见叙话的机会。本来,张镇芳的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,二人已成亲戚,关系很是亲近。袁世凯就力劝张镇芳出京城外调地方,到自己任职的山东担任要职,但张镇芳没有允诺。

1902年,李鸿章去世,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袁世凯即奏请调任张镇芳为直隶差委总办、天津河间兵备道,又长任长芦盐运使。

张镇芳在主管长芦盐场期间,驱逐了俄国、法国、日本等外国人的侵犯,理顺体制,拓展规模,剔除积弊,整顿有方,很快,长芦盐场得到很大发展。张镇芳还支持建立缉私总局,严查盐运走私。经过他兴利除弊,扩充销路,一年之间,就为国库增收银两56万两。至今,长芦盐场仍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。在此期间,张镇芳还同英国大使谈判,使英国人独霸的开滦煤矿转为中英合办。这是近代史上最早的中外合资合同之一。

1911年底,直隶总督陈夔龙因病乞休,张镇芳接替陈夔龙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成了清代最后一位直隶总督。张镇芳到任十天后(1912年2月12日),宣统皇帝退位,大清王朝也被画上了句号。

1912年3月,已是民国元年,张镇芳又调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。张镇芳到任后,又参照开滦煤矿的办法,将英国人独占的卫辉煤矿改制为中英合办,命名为福中公司。张镇芳不愧为一个善于管理、清廉干练、具有民族气节的人才。

后来,张镇芳又创办了盐业银行,该行成为我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,这也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业绩。

张镇芳不仅在维护国家经济权益、治理经济上有着干练、卓异的才能,同时,他也是一个热心现代教育事业的人。这里仅举一个例子。1912年,张镇芳正任河南都督。当年春,河南教育总会会长李时灿与河南提学使陈善同等人纷纷上书当局,力陈办学之必要。不久,张镇芳咨询河南省临时议会议定,筹设一所培养留学生的预备学校,主要学习外语,这就是河南大学的前身——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。可以说,张镇芳为河南大学的创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张镇芳还是一位诗人,曾亲手誊写、整理过自己的诗集《张镇芳诗抄》。据说,当时的太康县知名人士、曾考中进士、后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王新桢曾夸奖张镇芳的诗“如大将登坛,旌旗改色,纶巾羽扇,指挥如意”。有人则评说他的诗“志和音雅”,如“读史须如牛角挂,留名应似豹皮存”“节近端阳怀屈子,离骚读罢不成眠”“小楼独坐酌清樽,风卷帘栊雨打门”。这些诗句的确是蛮有情趣的。

张镇芳凭着他卓越的才干,一生在仕途上还是腾达的,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,但其间也有着重大的失误和挫折,使他一生毁誉参半,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人生悲剧。

(未完待续)

《张伯驹十五讲》  
作者 张恩岭